

# 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战略： 转型经济情境中的企业象征性创新

○ 江诗松 何文龙 路江涌

**摘要** 西方文献指出, 企业创新动力来自产品市场的竞争。本研究挑战了这一假定, 提出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创新动力还来自管理政企关系的需要, 并将这种产生于转型经济企业的独特创新行为称为象征性创新。本研究考察了何种条件下转型经济企业更倾向开展象征性创新的问题,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提出, 相比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开展象征性创新。进一步, 企业冗余资源以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降低这种倾向, 而针对2000-2010年425家中国上市公司1387个观察值的面板数据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本研究有助于更加完整地理解转型经济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行为, 并为调解已有转型经济企业创新研究的不一致发现提供了可能的理论线索。

**关键词** 创新; 政治战略; 象征性创新; 转型经济

## 引言

创新被视为企业在产品市场<sup>[1,2]</sup>和产品要素市场<sup>[3]</sup>中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最近几十年, 中国企业在创新的关键指标专利数量上实现了“汹涌”(Surge)或者“爆发式”(Explosion)的增长。<sup>[4,5]</sup>然而, 由于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体制难以保护创新相关的专利成果, 企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高风险和难以获利的战略。<sup>[6,7]</sup>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创新存在动力不足问题。这种创新动力和创新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谜题。

最近的少数政策研究为该谜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将

中国企业专利数量的增长与政治和制度前因联系在一起。如Li<sup>[5]</sup>提出并证实地方政府专利补贴的制度促进了企业专利的增长; Liefner等<sup>[8]</sup>对珠三角电子业民营中小企业的经验分析表明, 企业专利申请活动与政治目标之间存在联系。

受到这些政策研究的启发, 本文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 聚焦政企关系, 提出象征性创新的概念, 以解释转型经济企业独特的创新动力和行为。所谓象征性创新, 是指企业开展但并不期望在产品竞争中应用的创新。资源依赖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企业政治战略和政企关系相关的议题。<sup>[9-11]</sup>具体讲,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转型经济企业为何进行象征性创新? 转型经济企业在何种条件下更有可能进行象征性创新? 本文的逻辑是, 在转型经济情境中, 规制环境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企业对政府存在高度资源依赖性, 因而倾向于采用政治活动来管理这种不确定性和依赖性。由于创新一直是一项重要的政府议程, 导致企业将创新(特别是关键的专利指标)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来开展, 从而赋予了创新不同的意义, 本文称之为象征性创新。

本文认为, 相比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面临的规制环境更加不确定, 对政府的资源依赖更加迫切, 因而更倾向于开展象征性创新。此外, 民营企业如果具备更多的冗余资源, 可以缓解资源依赖程度, 以此作为规制环境变化的缓冲机制, 因而降低了民营企业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倾向。最后, 一个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 规制环境不

**作者简介** 江诗松,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创新战略; 何文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创新战略; 路江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

**基金资助**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213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6T90018)资助

确定性越低，政府控制资源的倾向越小，因而民营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也降低了其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倾向。中国上市公司2000-2010年425家企业1387个观察值的面板数据支持了本文的观点。

本文的贡献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的创新动力。传统研究将创新作为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一种武器。本研究则将创新作为企业管理政企关系的一种工具，为理解转型经济企业创新动力提供了新的洞见。其次，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解释了企业所有权性质、冗余资源，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是如何影响企业象征性创新的，与影响一般企业创新行为的机制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将象征性创新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战略，也为整合企业政治战略和市场战略提供了新的机制。

## 一、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 1. 象征性管理与象征性创新

企业行为包括象征性维度和实质性维度，二者相互独立。象征是指传达超越其功能用途的社会构建意义。比如办公室，其用途是工作场所，但一个有声望的办公室地址则可以象征企业的成功和地位。<sup>[12]</sup>Pfeffer<sup>[13]</sup>指出，在利益相关者发现难以评估和精确控制从一个组织得到的东西时，组织使用象征从而使行动与流行的规范和价值一致就特别重要。象征性管理有多种形式，一个普遍形式是采用正式满足法律要求和社会压力并且外部可见的结构和行为。<sup>[14]</sup>

企业象征性行为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境：第一种是创业，主要关注创业者如何通过语言<sup>[12]</sup>和非语言<sup>[15]</sup>等各种象征性行为获得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资源。第二种是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伦理和环境保护。<sup>[16-19]</sup>比如Stevens等<sup>[19]</sup>通过对美国407家企业的调查发现，非市场利益相关者压力更有可能带来伦理准则的象征性行为，而市场利益相关者压力更有可能带来伦理准则的实质性行为。第三种是公司治理和战略管理。Westphal等<sup>[20]</sup>的经验研究发现，象征性的公司治理行为可以带来积极的股东反应，并阻止更加实质性的公司治理改革。

本文认为，创新作为一种企业行为也具有象征性维度和实质性维度。实质性维度的创新即创新作为产品市场竞争的武器，已经被学者们大量研究。创新的象征性维度即象征性创新，迄今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文将象征性创新界定为企业开展但并不期望在产品竞争中应用的创新。由于象征性管理通常采用外部可见的形式，创新活动的可见形式——专利，也就成为象征性创新的

抓手。一位企业工程师在访谈中说：“很多专利是垃圾专利，但是申请高新技术企业需要。申请高新企业不仅可以领到补助，还能少交税，还有荣誉，跟技术实力没多大关系”。本文将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来阐述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象征性创新存在的制度前因。

### 2. 资源依赖理论和象征性创新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不是完全自治的组织，而是一个开放系统，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对外部环境的资源依赖性。<sup>[10,11,21]</sup>外部情境因素会影响组织行为，同时企业也采用各种行动来管理这些环境不确定性和依赖性，包括并购、垂直整合、合资公司、联盟、董事会、政治行动等。<sup>[10]</sup>本文聚焦企业通过政治行动来管理环境不确定性和依赖性。

转型经济中，政府对规制政策和稀缺资源有重要影响。<sup>[22]</sup>转型经济企业面临的挑战包括规制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政府对关键生产要素的控制。<sup>[23]</sup>一方面，转型经济中，规制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源于规制政策的动态性。规制政策的动态性反映了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尽管经济自由化的方向比较确定，但其变化领域、节奏、时机非常不确定。另一方面，政府控制了企业经营的关键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投资批准、技术基础设施等。<sup>[22,24,25]</sup>尽管转型经济向经济自由化发展，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仍然非常普遍，<sup>[25]</sup>包括国家战略规划、产业规划、反垄断政策等，<sup>[22]</sup>进一步加剧了规制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的关键资源控制。

由于规制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控制关键生产资源带来的政府依赖性，转型经济企业需要对政府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并采用政治活动或战略来管理这种外界不确定性和依赖性。<sup>[26]</sup>企业政治战略的定义，从最初的为了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做出的努力，<sup>[27,28]</sup>扩展到从政治环境获得最大经济利益所计划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行动。<sup>[29]</sup>因而，企业政治战略的内涵，从最初聚焦企业影响政府政策的战略，<sup>[27,28]</sup>到后期同时包括影响(Influence)战略和遵从(Compliance)战略，<sup>[29]</sup>或者影响(Influence)战略和衔接(Engagement)战略。<sup>[30]</sup>企业政治战略的研究表明，对政府依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开展政治活动。<sup>[28,31-33]</sup>Luo等<sup>[30]</sup>基于72个新兴经济体9123个企业的数据库证实，在转型经济中，政府官僚(比如各种各样的行政壁垒、规制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和一致性低)程度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

本文将企业象征性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在转型经济情境中，政治战略有其独特性，包括企业实施政府发布的政策，响应政府议程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sup>[9]</sup>自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政府议程,<sup>[34,35]</sup> 并鼓励企业投资创新发展。<sup>[22,24]</sup> 1985年, 中国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强调技术创新。1999年8月20日, 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提出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更是将创新, 特别是自主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 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展创新活动, 包括与业务经营关系不大的创新, 如象征性创新, 作为一项政治战略, 以塑造对企业自身有利的制度环境或者从政府政策环境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大企业可以通过政治战略影响制度环境, 而中小民营企业则可以通过政府政策环境获得经济利益, 例如利用专利补贴政策获得政府补贴、利用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政策赢得技术声誉并享受税收优惠。本文将考虑企业所有权、冗余资源、市场化程度, 并发展关于转型经济企业在何种情况下更有可能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假设。

### 3. 国有 vs 民营所有权与象征性创新

为了突出本研究的情境特点和本土性, 本文在主效应中考虑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企业所有权的多样性, 其中两种主要形式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sup>[36]</sup>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中国本土企业最重要的所有权形式, 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力量。研究表明,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竞争战略、<sup>[36]</sup> 知识创造<sup>[37]</sup> 等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理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独特的创新动机, 对于政府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创新相关的产业政策至关重要。从理论上讲, 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战略管理研究通常从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差异来切入, 如 Peng 等。<sup>[38]</sup> 总之, 探索和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开展象征性创新倾向的差异, 具有重要的理论以及政策和管理含义。

企业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制度环境, 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程度更高, 则企业更有可能开展象征性创新。<sup>[28,31-33]</sup> 本文认为, 相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制度环境, 且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更加迫切。通常而言, 国有企业有更多的渠道接触产业信息,<sup>[22,24]</sup> 因而可以降低其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此外, 国有企业受政府的直接制度支持和资源支持,<sup>[22]</sup> 因而不像民营企业那样迫切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取资源。<sup>[30]</sup> 在这些压力下, 为了克服

其制度劣势, 民营企业更有可能实施政治战略, 从而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相对于其他更加直接的政治战略, 将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战略, 也是民营企业更有能力实现的一种形式。因此, 本文提出:

H1: 相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更有可能进行象征性创新

### 4. 冗余资源的调节效应

文献表明, 冗余资源与企业政治活动相关。<sup>[28,33,39,40]</sup>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一方面, 民营企业为了从政府那里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 需要开展象征性创新这样的政治活动。如果民营企业拥有充足的冗余资源, 则对政府资源的依赖会大为减少, 因而也降低了开展政治活动的动力。反之, 如果民营企业缺少冗余资源, 则会开展政治活动以从政府获得资源。<sup>[28]</sup> 另一方面, 冗余资源也可以作为管理环境不确定性的一种缓冲机制。<sup>[41-44]</sup> 所谓冗余资源的缓冲机制是指冗余资源可以避免环境冲击的影响, 即放松了组织与制度环境之间的耦合,<sup>[45]</sup> 从而降低了民营企业对环境冲击做出反应的迫切性需要。<sup>[43]</sup> 因而, 环境不确定性对有冗余资源作为缓冲机制的民营企业而言, 并不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影响。事实上, Bourgeois<sup>[42]</sup> 将冗余资源视为一种“冲击吸收器”。

国有企业的典型行为是预算软约束,<sup>[46]</sup> 即当国有企业亏损时,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其他激励为其纾困(Bail out)或提供安全网(Safety Net)的情形。<sup>[47]</sup> 由于冗余资源可能只代表一种预算软约束,<sup>[48]</sup> 因而冗余资源高低不影响其本质行为, 包括对其政府资源依赖和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影响都不大。换言之, 国有企业的政府资源依赖和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其冗余资源并不敏感, 因而冗余资源对国有企业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影响有限。总之, 相对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倾向更易受到其冗余资源的影响。具体而言, 冗余资源水平越低, 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越倾向于开展象征性创新。因此, 本文提出:

H2: 冗余资源越低, 相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倾向更高

### 5. 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民营企业所在的运营环境向市场经济改革的程度越大, 一方面政府控制资源的程度越低, 市场更加发达, 提供的资源更多, 民营企业可以从市场而不是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sup>[49]</sup> 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越小, 政府对民营企业施加的压力也就越小, 管理自主性增加,<sup>[22]</sup> 从而民营企业采用象征性创新的政治活动动力也越小。另一方面, 市场转型程度越大, 制度环境更加规

范, 政府官员对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操纵更小,<sup>[50]</sup> 政府对企业运作的干预也更少,<sup>[51,52]</sup> 民营企业对制度环境的预测性增强, 从而企业经营不用担心受到制度环境波动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因而降低了民营企业通过象征性创新实施政治战略的需求。<sup>[51]</sup>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运营环境市场化转型程度越高, 其行业进入壁垒越低, 外部竞争程度越激烈, 因而更有利于内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 包括建立董事会和高管期权等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然而由于其管理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如高管仍由政府任命, 关键资源仍需依赖政府提供, 对于其资源依赖和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是有限的, 从而对其象征性创新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总之, 相对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倾向更易受到其运营环境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 运营环境市场化程度越低, 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越倾向于开展象征性创新。因此, 本文提出:

H3: 运营环境市场化程度越低, 相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倾向更高

## 二、研究方法

### 1. 研究数据和样本

本研究旨在初步探索中国企业创新的独特动机, 在开展定量研究前, 本文针对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技术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访谈。尽管这些访谈工作算不上系统的定性研究, 但为本定量研究特别是象征性创新的内涵、衡量以及影响因素提供了很多启发和洞见。本研究的定量数据收集基于 He 等<sup>[53]</sup>的工作。<sup>①</sup>他们从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收集中国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的上市公司数据, 然后与来自中国知识产权办公室 (SIPO) 的企业层次专利数据进行匹配。<sup>[53]</sup> 该方法与 Hall 等<sup>[55]</sup> 匹配 Compustat 上市公司数据和 USPTO 专利数据的方法类似, 即基于 Levenshtein 距离<sup>[56]</sup> 的计算机程序来匹配这两方面的数据。<sup>[53]</sup> 由于公开的数据仅包括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和专利数据, 在此基础上本文匹配收集了本研究涉及的相关变量, 包括企业所有权、财务信息、地区市场化指数、出口、高管团队等信息。

将样本期设定在 2000-2010 年的原因是, 2000 年中国企业专利申请开始快速增长, 而 2010 年则是 He 等<sup>[53]</sup> 数据匹配工作的截止期。该样本期中期大致对应 2006 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纲要”将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涵盖了带来企业创新压力的关键政策节点。由于因变量的衡量方法 (在变量衡量

中会详细讨论) 删除了样本期 (2000-2010) 未申请专利的上市公司观察值, 本文对所有模型的自变量做一年滞后处理, 最后的样本包括 425 个上市公司总共 1387 个公司年观察值。

### 2. 变量衡量

(1) 因变量: 象征性创新 (SYMBOL\_INNO)。根据创新研究的文献, 本文采用发明专利数量来衡量象征性创新。<sup>②</sup> 首先, 通过发明专利指标来衡量创新绩效是绝大部分创新研究的方法,<sup>[22]</sup> 其优点是数据客观, 公开可得性高。其次, 象征性创新的普遍形式是采用外部可见的结构和行为,<sup>[14]</sup> 而专利刚好符合外部可见这一特征。本文采用申请成功但 3 年后放弃续费的发明专利占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比例来衡量象征性创新。放弃续费表明企业没有预期这些专利会应用于其产品市场, 因此其申请动机主要在于获取政府的补贴。Huang<sup>[58]</sup> 指出, 如果没有补贴, 中国企业很多专利都不会被申请。换言之, 很多中国企业专利的申请是带有策略性的。<sup>[5]</sup> 一般专利补贴发生在申请过程及授权后 1 年内, 专利申请过程大概需要 2 年时间, 因而采用申请后 3 年放弃续费是合理的。此外,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还采用申请成功 2 年和 4 年后放弃续费的专利比例来衡量象征性创新。

(2) 自变量: 民营企业 (vs 国有企业) (POE)。民营企业 (vs 国有企业) 是中国上市公司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特征。由于很多中国上市公司采用金字塔所有权结构, 区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对精确的方式是考察其最终控制人。<sup>[22,59,60]</sup> 如果企业最终控制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政府所属机构, 则编码为 0, 否则为 1。

(3) 调节变量: ① 冗余资源 (SLACK)。根据 Bourgeois 研究,<sup>[42]</sup> 本文采用财务数据, 具体而言是用运营现金储备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冗余资源。<sup>[44,61]</sup> 现金是最容易部署的资源, 管理人员有最大的自由度将其配置在其他选择上,<sup>[44]</sup> 几乎可以用于任何目的。<sup>[61]</sup> ② 市场化程度 (MARKETIZATION)。在中国, 国民经济研究所 (NERI) 每年发布市场化指数来衡量省一级的制度发展。<sup>[62]</sup> 该指数包括五个指标: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展以及市场中介和法律环境的发展。很多文献都在用该指标衡量中国不同地区的制度发展程度。<sup>[22,50]</sup>

(4) 控制变量。作为创新研究, 本文控制了企业吸收能力 (ABSOR\_CAPA), 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 1000 来衡量。如果企业业务以出口为主, 则国内的政企关系将更不重要, 因此本文还控制了出口强度 (EXPORT),<sup>[22]</sup> 采用出口额占销售额比例来衡量。本文还控制了公司治

理变量的潜在影响, 包括公司治理指数 (CGI)、高管团队成员持股比例 (TMT\_SHAR) 以及前十大股东的 HHI 集中度指数 (HHI\_top10)。最后, 本文还控制了传统的企业特征变量, 包括企业年龄 (AGE, 采用对数处理)、企业规模 (SIZE, 采用员工数量的对数衡量)、企业杠杆 (LEVERAGE, 采用总负债占总资产比例来衡量) 和资产回报率 (ROA)。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产业的固定效应, 以分别控制宏观经济变动和产业差异的影响。

### 3. 分析方法

本文样本是一个 11 年 (2000-2010) 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根据 Wooldridge<sup>[63]</sup> 的研究, 本文采用以下程序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 用 Breusch-Pagan Lagrange Multiplier 检验来确定用面板数据方法还是混合最小二乘方法。一般而言, 当数据包含同一个单元 (如企业) 随时间变化的重复观察值, 并且这些重复的观察值相关时, 应该使用面板数据; 当数据同时具备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特征但没有组内自相关时, 应该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方法。检验结果表明, 数据存在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 ( $p=0.0001$ )。因此,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 该方法能处理相同单元相关的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其次, 对于面板数据方法, 本文需要选择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 解释变量与不可观测效应相关 ( $p=0.01$ ), 因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根据 Wooldridge 的研究,<sup>[63]</sup>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变换 (组内变换) 来消除不可观测的企业效应。所有模型的解释变量都滞后一期。

## 三、研究结果

表 1 展示了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最高的 VIF 是 3.5, 表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SYMBOL_INNO	POE	MARKETIZATION	SLACK	AGE	SIZE	ABSOR_CAPA	ROA	EXPORT	CGI	LEVERAGE	HHI_top10
SYMBOL_INNO	0.03	0.12	1.00											
POE	0.26	0.44	0.02	1.00										
MARKETIZATION	8.64	2.44	-0.14	0.11	1.00									
SLACK	19.81	1.39	-0.02	-0.14	0.14	1.00								
AGE	2.38	0.44	-0.05	0.03	0.26	-0.09	1.00							
SIZE	7.95	1.31	0.02	-0.10	-0.01	0.61	0.01	1.00						
ABSOR_CAPA	0.02	0.15	-0.02	-0.04	0.09	0.19	-0.00	0.18	1.00					
ROA	0.03	0.06	-0.02	0.08	0.01	0.19	-0.12	0.07	0.00	1.00				
EXPORT	0.21	0.2	-0.03	0.08	0.19	-0.04	0.00	0.03	0.06	0.01	1.00			
CGI	0.28	1.56	-0.06	0.39	0.28	-0.09	0.39	-0.07	0.04	-0.05	0.07	1.00		
LEVERAGE	0.34	0.27	-0.01	-0.00	-0.05	0.13	0.07	0.25	0.07	-0.10	-0.01	0.05	1.00	
HHI_top10	0.2	0.14	0.02	-0.23	-0.13	0.30	-0.38	0.25	0.01	0.14	-0.09	-0.77	-0.00	1.00
TMT_SHAR	0.01	0.05	0.04	0.28	0.14	-0.08	-0.21	-0.10	-0.01	0.09	0.14	0.27	-0.09	-0.14

注: n=1387 观察值; 在相关系数绝对值  $\geq 0.06$  时,  $p < 0.05$

表2 所有权、冗余资源、市场化程度和象征性创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MARKETIZATION	0.012	(0.012)	0.016	(0.012)	0.01	(0.012)	0.014	(0.012)
SLACK	0.003	(0.006)	0.002	(0.006)	0.012*	(0.007)	0.009	(0.007)
AGE	0.129**	(0.051)	0.127**	(0.051)	0.122**	(0.051)	0.121**	(0.051)
SIZE	0.009	(0.008)	0.01	(0.008)	0.01	(0.008)	0.01	(0.008)
ABSOR_CAPA	-0.006	(0.052)	-0.01	(0.052)	-0.01	(0.052)	-0.012	(0.051)
ROA	0.008	(0.038)	0.007	(0.037)	0.003	(0.037)	0.003	(0.037)
EXPORT	0.107	(0.071)	0.125*	(0.071)	0.121*	(0.071)	0.129*	(0.071)
CGI	-0.005	(0.050)	-0.012	(0.050)	-0.026	(0.051)	-0.031	(0.051)
LEVERAGE	0.003	(0.006)	0.002	(0.006)	0.002	(0.006)	0.001	(0.006)
HHI_top10	0.011	(0.085)	0.021	(0.085)	0.003	(0.085)	0.013	(0.085)
TMT_SHAR	0.106	(0.170)	0.002	(0.172)	0.043	(0.170)	-0.013	(0.172)
POE			0.231***	(0.067)	0.855***	(0.255)	0.807***	(0.256)
POEX								
MARKETIZATION			-0.021***	(0.007)			-0.015**	(0.007)
POE×SLACK					-0.042***	(0.013)	-0.032**	(0.014)
Year Fixed Effects	YES		YES		YES		YES	
Firm Fixed Effect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224	(0.180)	-0.257	(0.179)	-0.384**	(0.186)	-0.375**	(0.186)
F	3.580***		3.838***		3.881***		3.929***	
Within R <sup>2</sup>	0.0670		0.0790		0.0800		0.0840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425 个企业, 1387 个观察值。\*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表 2 展示了假设检验的结果。模型 1 显示了控制变量的结果, 模型 2 和 3 显示了分别加入自变量 POE 和调节变量 SLACK、MARKETIZATION 交互效应的结果, 模型 4 加入了所有变量。本文根据模型 4 的结果来判断假设是否被支持。假设 1 预测民营企业 (相对于国有企业) 更倾向于开展象征性创新。与此一致, 民营企业 (相对于国有企业) (POE) 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 ( $\beta=0.807$ ,  $p < 0.01$ ), 因此假设 1 得到支持。假设 2 预测在具备高冗余资源条件下, 民营企业 (相对于国有企业) 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可能性降低。与此一致, 民营企业 (相对国

表3 象征性创新的稳健性分析

变量\模型	2年后放弃的专利比例		4年后放弃的专利比例		2年后放弃 (Tobit回归)		3年后放弃 (Tobit回归)		4年后放弃 (Tobit回归)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POE	0.519***	(0.194)	0.828***	(0.294)	2.573**	(1.101)	3.075***	(1.126)	2.970**	(1.228)
POE×MARKETIZATION	-0.008	(0.005)	-0.019**	(0.008)	-0.031	(0.030)	-0.048	(0.030)	-0.044	(0.033)
POE×SLACK	-0.022**	(0.010)	-0.030*	(0.016)	-0.112**	(0.056)	-0.128**	(0.057)	-0.123**	(0.063)
MARKETIZATION	0.005	(0.009)	0.030**	(0.014)	-0.001	(0.019)	0.001	(0.018)	-0.004	(0.021)
SLACK	-0.001	(0.005)	0.016**	(0.008)	0.031	(0.032)	0.070**	(0.031)	0.071**	(0.033)
AGE	0.054	(0.039)	0.207***	(0.059)	0.086	(0.089)	0.145*	(0.087)	0.221**	(0.098)
SIZE	0.009	(0.006)	0.013	(0.010)	0.071**	(0.033)	0.079**	(0.031)	0.094***	(0.034)
ABSOR_CAPA	-0.003	(0.039)	-0.007	(0.059)	0.038	(0.081)	0.029	(0.086)	0.037	(0.098)
ROA	164.0	(283.298)	-391.3	(429.431)	37.74	(1503.123)	-621.4	(1490.006)	-477.9	(1623.991)
EXPORT	0.111**	(0.054)	0.181**	(0.082)	0.307	(0.400)	0.154	(0.399)	0.360	(0.435)
CGI	-0.036	(0.038)	-0.035	(0.058)	0.095	(0.115)	-0.002	(0.113)	0.011	(0.126)
LEVERAGE	0.001	(0.005)	0.001	(0.007)	0.039	(0.034)	0.026	(0.034)	0.024	(0.038)
HHI_top10	0.038	(0.064)	0.084	(0.098)	0.332	(0.360)	0.201	(0.359)	0.188	(0.395)
TMT_SHAR	-0.050	(0.130)	0.013	(0.197)	0.460	(0.486)	0.768	(0.501)	0.820	(0.556)
Year Fixed Effect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Fixed Effect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ixed Effects	YES		YES		No		No		No	
Constant	-0.038	(0.141)	-0.780***	(0.213)	-3.326	(249.768)	-4.402	(295.331)	-4.774	(225.321)
F [Log-likelihood]	3.197		5.447		[-258.9]		[-334.1]		[-367.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425 个企业 1387 个观察值；\*p<0.1, \*\*p<0.05, \*\*\*p<0.01

有企业)与冗余资源的交互项(POE×SLACK)系数负向显著( $\beta=-0.032$ ,  $p<0.05$ ),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假设3预测在高市场化地区运营条件下,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开展象征性创新的可能性降低。与此一致,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POE×MARKETIZATION)系数负向显著( $\beta=-0.015$ ,  $p<0.05$ ),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本文还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表3展示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本文改变了象征性创新的衡量方式,在主分析中采用申请成功但3年后放弃续费的专利比例来衡量象征性创新。在稳健性检验中,分别采用申请成功但2年后以及4年后放弃续费的专利比例来衡量象征性创新。模型5、6的结果表明,假设1、2和3仍然得到支持。由于主分析的因变量属于受限变量(介于0、1之间),本文还采用Tobit回归分析。由于Tobit回归固定效应估计量不是一致的,会产生更低的标准误,因此采用Tobit随机效应来分析。<sup>[65,66]</sup>其优势在于可以加入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比如产业虚拟变量,这有助于降低企业特定效应带来的偏误。Tobit随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模型7、8、9),假设1、2得到支持,只有假设3没有被支持,民营企业与冗余资源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但方向也与假设一致。总体而言,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主分析结果大致一致。

#### 四、研究讨论和结论

西方文献认为企业创新动力来自产品市场的竞争。<sup>[1,2]</sup>

由于中国知识产权体制对创新的保护比较薄弱,理论上中国企业创新动力应该是不足的。<sup>[6,7]</sup>然而现实是,中国企业创新结果比如专利指标呈现爆发增长的模式。<sup>[4,5]</sup>这种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促使本文重新思考中国企业或者更一般的转型经济企业的创新动力。本文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聚焦政企关系,提出象征性创新的概念,以解释转型经济企业独特的创新动力。本文认为,在转型经济情境中,规制环境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企业对政府存在高度资源依赖性,因而倾向于采用政治活动来管理这种不确定性和依赖性。由于创新一直是一项重要的政府议程,导致企业将创新(特别是关键的专利指标)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来开展,作为转型经济情境中独特的创新动力。本文将这种转型经济独特动力的创新称为象征性创新。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开展象征性创新。并且,这一倾向随着企业运营的制度化环境水平和企业冗余资源的提升而降低。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如下:第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企业创新的动力。传统创新研究将创新作为公司在产品市场竞争的一种武器。<sup>[1,2]</sup>Hsu等<sup>[3]</sup>提到创新在企业生产要素市场中的角色,本研究认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创新具备新的动力,即作为管理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一种工具。政企关系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传统创新研究只关注创新在产品竞争中的角色,但忽视了创新对于转型经济企业政企关系中的另一个角色,因而不能解释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

体制薄弱情况下仍然实现了专利的汹涌式增长或爆发式增长。<sup>[4,5]</sup>同时关注创新对转型经济企业在市场领域(实质性创新)和非市场领域(象征性创新)的双重角色,有助于本文更加完整地理解转型经济企业的创新动力。在概念上,本文提出用象征性创新来刻画对转型经济企业创新动力的新洞见,对转型经济情境下的本土研究有贡献。<sup>[66,67]</sup>本文还首次对象征性创新进行了衡量,希望可以刺激更多的象征性创新经验研究。当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概念,本文也鼓励对其多样化的操作化方法,比如调查、内容分析等,以丰富其研究的可能性。

第二,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了象征性创新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这些决定因素的影响方向与对传统创新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甚至相反。在政企关系框架中,本文将象征性创新概念化为一种政治战略。根据资源依赖理论,本文提出并检验了转型经济企业在何种条件下更有可能开展象征性创新。首先,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有可能开展象征性创新。已有研究对于转型经济企业国有所有权对传统创新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有些是正向的,<sup>[68]</sup>有些是负向的,<sup>[69]</sup>有些则是倒U形。<sup>[22]</sup>本文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所有权对不同创新动力的影响机制和方向不一样。象征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运作的领域截然不同,传统创新研究没有区分这两种不同种类的创新,因而难以得出一致性结论。其次,冗余资源降低了民营企业象征性创新的倾向,这与冗余资源促进企业创新的传统见解<sup>[61]</sup>也大相径庭,其原因同样在于象征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的动力机制不一样。为了澄清象征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的不同后果,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和比较象征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的后果及其作用机制。

第三,本文对政治战略研究也有贡献:首先,提出了转型经济情境下一种新的政治战略:象征性创新。不同于西方文献对政治战略(财务激励、信息和选民培育)的类别,<sup>[28,32]</sup>这种独特的政治战略与已有转型经济背景下政治战略文献的政治运动战略(实施政府发布的政策)<sup>[9]</sup>相一致。象征性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战略与政府鼓励创新的制度压力相关。其次,本研究对政治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也有意义。创新具有实质性和象征性双重角色,是整合政治战略和市场战略的内在机制。根据象征性管理文献,<sup>[12]</sup>实质性和象征性可能共存,有些创新可能兼具实质性和象征性特征(尽管本文对象征性创新的操作化排除了这一可能)。有些因素可能同时影响象征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比如本研究的国有所有权和冗余资源)。未来研究可以考察企业在制定创新战略或进行创新决策时,如何平衡或整合象征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

本研究对创新还有政策意义。创新的外部性特征表明创新面临投资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因而政府需要鼓励创新。本研究认为,在转型经济情境下,政府鼓励创新的强度过大会迫使企业开展象征性创新,因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换言之,政府面临一个基本的权衡:对创新的鼓励和因此带来的社会财富浪费。也许政府鼓励创新的更合适方式是,要么以研发投入为基础,要么以创新的商业化成功为基础,而以中间结果如专利作为补贴的基础会带来社会财富的浪费。此外,本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会减弱民营企业的象征性创新倾向。因此,市场化政策可以作为降低社会财富浪费的一个创新政策工具。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市场化政策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首先,尽管本文对象征性创新的衡量有一定创造性,并且相对现有文献<sup>[54]</sup>更能够刻画其概念内涵,但不能排除企业放弃续费存在其他原因的可能性,包括企业业务转型(本研究中纳入企业所在产业的固定效应可以部分缓解这个问题)或存在新一代发明专利的保护等更加复杂的情况。如何在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中识别这些更微妙的情况,是未来研究需要考虑的。其次,本文的逻辑是政府过于鼓励创新,以致给企业造成过大压力,从而使其开展象征性创新。然而,本文没有直接衡量政府鼓励创新的程度。再次,本文只考察了两个调节变量,未来还可以研究其他调节变量,如战略导向、创业导向等。最后,本文的样本局限于上市公司,只代表了一部分的中国企业,而上市需要满足各种门槛条件,<sup>[59]</sup>这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 参考文献

- [1] Ahuja, G., Lampert, C. M., Tandon, V.. Moving beyond Schumpeter: Management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08, 2(1): 1-98.
- [2]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3] Hsu, D. H., Ziedonis, R. H.. Resources as Dual Sources of 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Valuing Entrepreneurial-firm Paten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7): 761-781.
- [4] Eberhardt, M., Helmers, C., Yu, Z.. Is the Dragon Learning to Fly?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Patent Explosion. *The Economist*, 2010, (4): 1-32.
- [5] Li, X.. Behind the Recent Surge of Chinese Patenting: An Institutional View. *Research Policy*, 2012, 41(1): 236-249.
- [6] Young, M. N., Tsai, T., Wang, X., Liu, S., Ahlstrom, D.. Strategy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sia Pacific*

-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31(2): 331-354.
- [7] Zhao, M.. Conducting R&D in Countries with Wea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8): 1185-1199.
- [8] Liefner, I., Kroll, H., Peighambari, A.. Research-driven or Party-promoted? Factors Affecting Patent Applications of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6, 43(6): 849-858.
- [9] He, Y., Tian, Z.. Government-oriented Corporate Public Rela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8, 4(3): 367-391.
- [10] Hillman, A. J., Withers, M. C., Collins, B. J..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 Re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35(6): 1404-1427.
- [11] Zheng, W., Singh, K., Mitchell, W.. Buffering and Enabling: The Impact of Interlocking Political Ties on Firm Survival and Sales Growt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11): 1615-1636.
- [12] Zott, C., Huy, Q. N.. How Entrepreneurs Use Symbolic Management to Acquire Resourc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7, 52(1): 70-105.
- [13] Pfeffer, J.. Management as Symbolic Actio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rganizational Paradigms. In Cummings, L., Staw, B.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1, (3): 1-52. Greenwich: JAI Press.
- [14] Markóczy, L., Li Sun, S., Peng, M. W., Shi, W., Ren, B.. Social Network Contingency, Symbolic Management, and Boundary Stretch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11): 1367-1387.
- [15] Clarke, J.. Revitalizing Entrepreneurship: How Visual Symbols are Used i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6): 1365-1391.
- [16] Christmann, P., Taylor, G.. Firm Self-regul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Certifiable Standards: Determinants of Symbolic Versus Substantive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6): 863-878.
- [17] Delmas, M. A., Montes-Sancho, M. J.. Voluntary Agreements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Symbolic and Substantive Coope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6): 575-601.
- [18] Short, J. L., Toffel, M. W.. Making Self-regulation More than Merely Symbolic: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Legal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0, 55(3): 361-396.
- [19] Stevens, J. M., Kevin, S. H., Harrison, D. A., Cochran, P. L.. Symbolic or Substantive Document? The Influence of Ethics Codes on Financial Executives' Decis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2): 181-195.
- [20] Westphal, J. D., Zajac, E. J.. The Symbolic Management of Stockholders: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s and Shareholder Reac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8, 43(1): 127-153.
- [21] Davis, G. F., Adam Cobb, J.. 2010. Chapter 2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Past and Future, *Stanford's Organization Theory Renaissance, 1970-2000*: 21-42: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 [22] Zhou, K. Z., Gao, G. Y., Zhao, H.. State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 An Integrated View of Institutional and Efficiency Logic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7, 62(2): 375-404.
- [23] Gao, G. Y., Murray, J. Y., Kotabe, M., Lu, J.. A "Strategy Tripod" Perspective on Export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Firms Based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3): 377-396.
- [24] Chen, V. Z., Li, J., Shapiro, D. M., Zhang, X..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An Emerging Market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31(1): 1-24.
- [25] Luo, Y..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Managerial Networking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Case of Chin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13): 1315-1327.
- [26] Marquis, C., Qian, 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in China: Symbol or Substa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4, 25(1): 127-148.
- [27] Baysinger, B. D.. Domain Maintenance as an Objectiv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An Expanded Typolog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248-258.
- [28] Hillman, A. J., Keim, G. D., Schuler, D..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4, 30(6): 837-857.
- [29] Oliver, C., Holzinger, I..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c Political Management: A Dynamic Capabilities Frame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33(2): 496-520.
- [30] Luo, Y., Junkunc, M.. How Private Enterprises Respond to Government Bureaucracy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Type and Governanc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8, 2(2): 133-153.
- [31] Birnbaum, P. H..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Regulated Organizations as Functions of Context and Fea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5, 6(2): 135-150.
- [32] Hillman, A. J., Hitt, M. A..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 A Model of Approach, 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y Decis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4): 825-842.
- [33] Meznar, M. B., Nigh, D.. Buffer or Bridge?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ffairs Activities in American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4): 975-996.
- [34] Fischer, W. A., Von Zedtwitz, M.. Chinese R&D: Naisance, Renaissance, or Mirage? *R&D Management*, 2004, 34(4): 349-365.
- [35] Yang, J., Liu, H., Gao, S., Li, 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Firms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9(3): 819-840.
- [36] Peng, M. W., Tan, J., Tong, T. W.. Ownership Types and Strategic Group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4, 41(7): 1105-1129.
- [37] Walsh, I. J., Bhatt, M., Bartunek, J. M..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5, 5(2): 261-278.



- [38] Peng, M. W., Luo, Y. D.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 486-501.
- [39] Schuler, D. A..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the Steel Indust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3): 720-737.
- [40] Schuler, D. A., Rehbein, K., Cramer, R. D.. Pursuing Strategic Advantage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A Multivariate Approa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4): 659-672.
- [41] Bode, C., Wagner, S. M., Petersen, K. J., Ellram, L. M.. Understanding Responses to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Insights fro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4): 833-856.
- [42] Bourgeois, L. J.. On the 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1, 6(1): 29-39.
- [43] Cheng, J. L. C., Kesner, I. F..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Shifts: The Impac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7, 23(1): 1-18.
- [44] George, G.. Slack Resourc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ly Held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4): 661-676.
- [45] Kraatz, M. S., Zajac, E. J.. How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ffect Strategic Change and Performance in Turbulent Environ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1, 12(5): 632-657.
- [46] Kornai, J., Maskin, E., Roland, G..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3, 41(4): 1095-1136.
- [47] Stan, C. V., Peng, M. W., Bruton, G. D.. Slack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31(2): 473-495.
- [48] Ju, M., Zhao, H.. Behind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Ownership and Competitive Intensit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26(4): 701-717.
- [49] Jia, N.. Are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s and Private Political Action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Private Secto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2): 292-315.
- [50] Sun, P., Hu, H. W., Hillman, A. J.. The Dark Side of Board Political Capital: Enabling Blockholder Rent Appropri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5): 1801-1822.
- [51] Du, X., Luo, J. h.. Political Connections, Home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6, 12(1): 103-133.
- [52] Yang, H., Ru, J., Ren, T.. Ownership and M&A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5, 11(4): 715-737.
- [53] He, Z., Tong, T., He, W., Zhang, Y., Lu, J.. Chinese Patent Database User Documentation: Matching SIPO Patents to Chinese Publicly-Listed Companies and Subsidiaries[EB/OL];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3aYSKx9DasbWE1LdTBVdDAW-TWM/edit?pli=1>.
- [54] He, Z. L., Tong, T. W., Zhang, Y., He, W.. Constructing a Chinese Patent Database of Listed Firms in China: Descriptions, Lessons, and Insights.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18, 27(3): 579-606.
- [55] Hall, B. H., Jaffe, A. B., Trajtenberg, M.. The NBER Patent Citation Data File: Lessons, Insights and Methodological Tool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1.
- [56] Levenshtein, V. I.. Binary Codes Capable of Correcting Deletions, Insertions, and Reversals. *Soviet Physics Doklady*, 1966, 10(8): 707-710.
- [57] 黎文靖, 郑曼妮.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 *经济研究*, 2016, (4): 60-73.
- [58] Huang, C..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China and Challenges Ahead.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7, 13(1): 39-48.
- [59] Wang, H., Qian, C..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Roles of Stakeholder Response and Political Acc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6): 1159-1181.
- [60] Zhang, Y., Qu, H.. The Impact of CEO Succession with Gender Change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Early Departure: Evidence from China's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in 1997-2010.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5): 1845-1868.
- [61] Voss, G. B., Sirdeshmukh, D., Voss, Z. G.. The Effects of Slack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Threat on Product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51(1): 147-164.
- [62]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度报告.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63]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MIT Press, 2010.
- [64] Cameron, A. C., Trivedi, P. K.. *Micro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65] Greene, W. H.. *Econometric Analysis*. Boston, MA: Prentice Hall, 2008.
- [66] Li, P. P., Leung, K., Chen, C. C., Luo, J. D.. Indigenous Research on Chinese Management: What and How.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2, 8(1): 7-24.
- [67] Tsui, A. S.. Contributing to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 A Case for High Quality Indigenous Research.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4, 21(4): 491-513.
- [68] Choi, S. B., Lee, S. H., Williams, C..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11, 40(3): 441-452.
- [69] Guan, J. C., Richard, C., Tang, E. P., Lau, A. K..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Evidences in Beijing,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09, 38(5): 802-812.

注释

① 他们构建该数据库是希望该数据库被广泛使用,<sup>[54]</sup> 以此“鼓

励更多的中国专利研究, 促进对中国创新全景的理解”,<sup>[55]</sup> 从而对中国的创新研究做出贡献, 为创新研究提供很好的数据平台。事实上, Hall<sup>[55]</sup> 在其个人主页 (<https://eml.berkeley.edu/~bhall/patents.html>) 分享了该数据库的链接, 以促进对该数据的全球广泛使用。

- ② 黎文靖等<sup>[57]</sup> 曾提出一个与本文象征性创新相类似的概念: 策略性创新, 并采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数量来衡量(同时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实质性创新)。根据本文在开展定量研究之前的访谈, 这种简单的衡量方法可能难以刻画象征性创新的内涵。业内人士告诉我们, 政府通常并非简单采用总的专利数量来评价企业创新绩效, 而是更加关注和重视发明专利的数量。比如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企业技术中心级别等的评价都会涉及发明专利数量的考量。因而, 企业为了满足政府的要求, 在发明专利中也存在大量的象征性活动。本研究采用发明专利来衡量象征性创新, 一方面符合创新研究文献的规范做法,<sup>[22]</sup> 另一方面也是对象征性创新更加保守的估计, 基于该衡量的结论也相对更加稳健。

### Innovation as Political Strategy: Corporate Symbolic Innov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y

Jiang Shisong<sup>1</sup>, He Wenlong<sup>2</sup>, Lu Jianguyong<sup>3</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2.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3.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estern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firms innovate to compete in product markets. Due to weak appropriability regim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inese firms should under-invest innovation activities. However, this theoretical prediction is not consistent with recent explosion growth of patent indicators of Chinese firms. This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ory and evidence prompts us to reconsider the innovation motivation of transition economy firms in general or Chinese firms in particular.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that firms also innovate to manage business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 economies. This innovation behavior, specific to transition economy firms, is termed symbolic innov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under what conditions transition economy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conduct symbolic innovation. Drawing on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it is proposed that, compared to SOEs, private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conduct symbolic innovation due to their more desperate dependency on government for key resources (as opposed to the institutionalized support for SOEs). Furthermore, resource slacks and market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where firms operate reduce this tendency because their resource dependency on governments is less a concer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425 Chinese listed firms (1387 firm-year observations) support these hypotheses. This study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novation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of transition economy firms, and provides potential the-

oretical thread to reconcile the inconsistent findings on innovation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 economies. In short,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nnovation motivation of transition economy firms and identifies a new type of political strategy in this context.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aiming to uncover the unique innovation motivation of transition economy firms using firms' resource dependence on government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e hope this study, and especially our new way of operationalization for symbolic innovation, would stimulate more future research on symbolic innov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y context.

**Key Words** Innovation; Political Strategy; Symbolic Innovation; Transition Economy